



传统文化承载者的世纪变迁

——李健《西藏的唐卡艺人》序言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6)01-0073-05

● 马 戎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志码 :E

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当中,历史上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相对较少的当属西藏。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多米,空气稀薄,干燥少雨,除少数河谷外,大部分土地并不适合农耕。藏北海拔 4500 米以上的大片区域不适合人类生存。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在这样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条件下,青藏高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体系,并在这个自然生态体系中演化出来一个独立的人文生态体系。藏人、藏语文、藏传佛教便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元素。所以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境内有三个大的文化集团,即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和藏文化集团,青藏高原上的藏文化集团为其中之一。

自唐朝以来,西藏的吐蕃王国便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藏传佛教也成为中原佛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由于皇室笃信藏传佛教,西藏与内地的交往越加频繁。自 1792 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后,西藏地区纳入清朝的行政体系,开始与内地建立了制度化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人员交往。辛亥革命后,西藏一度出现“驱汉”和追求独立的倾向。1951 年《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1965 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尽管近几十年里西藏与内地的人员交流、经济关系日益加强,但是不同的生态体系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和隔膜仍然十分明显。这也使得西藏研究和藏族文化研究成为国内民族社会学的重点研究领域。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6 年第 1 期(总第 88 期)

2016.No.1(Total No.88)

我第一次进藏是1988年夏天,当时在费孝通和多杰才旦两位老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设立了一个西藏社会发展的研究项目,我和调查组的其他成员们一起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学户访问问卷调查,在拉萨、日喀则、山南三个地区获取了有效问卷1300份。在分析此次调查所获数据的基础上,我在1996年出版了《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也正是通过这个项目的调查,我结识了藏研中心科研处的旦增伦珠,调查组进藏期间,他是我们的联络人和协调人。1997年他到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此后长期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与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

90年代我的关注点转移到了新疆,因此近些年几乎每年都要去几次新疆。加上年纪的原因,担心身体不适,便没有再去西藏开展实地调查了。这期间旦增伦珠也曾安排了我进藏的机会,联系了西藏大学与我开展科研合作,已经定好了机票,但是因为某些意外原因的干扰未能成行,这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一件事。但是我始终没有完全放弃西藏研究,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做两件事:一是积极招收藏族研究生,鼓励他们开展与西藏相关的调查研究;二是争取机会让我指导的各族研究生参加西藏科研项目。在这个方面,旦增伦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领导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承担的许多课题也很需要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调查人员。近几年来,在我指导的学生当中参加过西藏调查的先后有常宝、祖力亚提·司马义、李健、王娟、欧登草娃、王凡妹、旦正才旦、王向珣、常艳玲和尼玛顿珠共十人。而且我特别希望有其他民族背景的学生也有机会去西藏看看,从而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些更直观的感受。以上参加了西藏调查项目的十名研究生,分别具有蒙古、维吾尔、藏、回、汉等族群背景。

在上述学生当中,李健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化德县的汉族学生。化德县紧邻我曾经工作过的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从镶黄旗去呼和浩特要经过化德县,1977年有一次因为没有班车,我曾经从化德县城徒步六十多公里走回镶黄旗,所以我对化德有些感性认识。2009年李健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考到北京大学。由于他具有内蒙古的生活背景,我一度计划让他专注内蒙古研究,还鼓励他学习蒙古语。后来旦增的西藏课题急缺调查人手,就把他派到了西藏调查组。谁知李健参加了西藏调查后,便对西藏着了迷,努力学习藏语,对西藏文化和西藏社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也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鼓励他继续从事西藏研究。

关于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我也和他讨论过多次。他历次赴藏参加那些常规社会经济发展的专题调查、城乡居民家计调查等,固然可以在实地调查所获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调查报告和专题研究论文,但是很难在学术层面上加以提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不合适。我一直在想,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达到几个基本要求:第一,这个主题能够比较鲜明地反映和折射出西藏百年来深刻的社会变迁,为此要选择一个能够集中和生动反映社会急剧变化、文化被动转型的特殊社区或群体,这个群体必须有某种代表性,可视为西藏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某种缩影,对于它所承载的区域文化特质、社会组织特征及其变迁的分析与讨论能够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有一定的连接,换言之,相关的分析讨论必须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围绕这一群体和相关专题的研究分析讨论要能够给学生提供在基础理论上拔高和开展学术对话的空间;第二,围绕这一选题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包括调查时间、资料规模与调查难度)可以与一篇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工作量大致相当,人类学强调有一年的田野调查,对于这一主题的被选择群体的实地调查时间累计起来也应不少于一年;第三是这个选题的政



治敏感度在实际调查活动中具有可操作性。现在许多政府管理的历史档案材料不对学者和社会公开,许多历史和现实选题仍被列入“政治禁区”,因此有些选题不仅调查难,成果发表也难。考虑到学生未来在就业和职称等方面必然面临论文发表的要求,那些有政治敏感度的研究专题也不宜安排学生作为学位论文选题。

通过我对西藏社会的文献阅读、实地感受及与藏族学者的交流,我感到有几个群体大致符合我的要求。这几个群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历史延续性,具有稳定的内部组织体系,所从事的职业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20世纪特别是50年代以来经历了衰落而又重新兴起的历史性转型过程。同时,对于这些重大变化的过程描述和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需要相当时间的文献整理和实地调查,而对于这几个群体的历史角色演变的分析,也可以对西藏传统文化的历史走向提出学术层次的讨论。

其中第一个群体是西藏的僧侣群体。藏传佛教历史悠久,形成一整套寺庙组织体系和宗教文化知识体系。1951年喇嘛人数约占西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1958年仍有2771座寺庙和11.4万喇嘛,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的1976年,只保存了8座寺庙和800名喇嘛。随着后来落实宗教政策工作的开展,1994年寺庙恢复到1552座,僧尼41,800人。寺庙和僧人是藏传佛教的核心,寺庙数量和僧人规模的大起大落,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西藏的社会变迁和中央政府宗教政策的演变。相关研究还可以与国外的宗教群体研究进行比较和对话。但是,在藏区对寺庙开展深入调查的难度太大。旦增曾经在哲蚌寺进行过调查,完成了一篇调研报告,他的经历使我确信这不是李健的适当选题。一是进入的难度大,寺庙近些年来成为“敏感单位”,政府派了“驻寺工作组”,僧人的抵触情绪也在预料之中。二是深入的难度大,如果不熟悉藏传佛教的经典文献,调查者很难理解僧侣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很难理解寺庙的运行规则。而宗教社会学研究之所以难度特别大,就是因为研究者必须是所研究宗教的专家。不是专家就无法理解宗教组织和教徒的理念与行为,但是一旦成了某一个宗教的虔诚信徒,也就往往难免丧失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超脱立场来客观地分析各种宗教组织和教徒活动的的能力,即从“自我”到“他者”立场的转换。从以上各方面考虑,我认为这不是适合李健的博士论文选题。

另一个群体是西藏的说唱艺人或游吟歌手。这也是一个古老的群体,希腊神话的许多内容,便是由说唱艺人荷马得以流传。西藏的《格萨尔》是藏族说唱艺人最经典的话本,近年来挖掘收集的《格萨尔》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除了寺庙保存的抄本外,《格萨尔》在民间的传播主要靠四处旅行的说唱艺人。这个群体在50年代后基本消失,到了80年代又重新出现。随着《格萨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藏学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格萨尔》版本的收集和说唱艺人的传承也开始受到文化部门的重视,据说现在的西藏还有几百位能够表演《格萨尔》的说唱艺人。这个群体也可以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来进行调查,但是对研究者的藏语文水平要求较高,这个选题更适合民俗学或文化人类学者来进行调查研究。

我所考虑的最后一个群体就是唐卡画师。唐卡是西藏特有的与藏传佛教密切联系的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①在寺庙和藏民家中通常都会看到各种不同档次的佛

^① 根据制作唐卡所用材料,唐卡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用丝绢制成的叫“国唐”,下分

像唐卡供奉在佛堂里。绘制唐卡大多采用天然石材加工颜料,从公元7世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唐卡在地域上形成了三大主流画派:卫藏地区的勉唐画派,康巴地区的噶玛噶孜画派和安多地区的热贡画派。唐卡以宗教内容为主,在传统上唐卡画师以僧人为主,师徒相授,把唐卡绘画视为一种特殊的宗教修行,形成西藏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行业体系。藏区著名的大活佛都有自己专门的唐卡画师。这个社群历史悠久,过去有自己的职业组织与行规,在1959年随着宗教活动的淡化而一度销声匿迹,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寺庙的重建和旅游业的发展再度兴盛起来。神圣的唐卡现在成为市场上销售的旅游商品,在拉萨的街角摊铺里充斥了粗制滥造的唐卡。唐卡在旅游市场上的热卖使得拉萨、昌都等地出现了许多唐卡画廊和大小作坊,一些精致的唐卡甚至来自境外的尼泊尔。唐卡画师的社会组织也在市场冲击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一个与宗教密切联系的传统手工画师群体,在近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必然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西藏社会变迁提供一个绝好的视角。而且,相比寺庙僧侣集团,唐卡画师群体更容易进入和调查,不存在任何政治敏感性的问题,而且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可以派上很好的用场。从以上诸方面考虑,我建议李健考虑把唐卡画师群体的历史变迁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李健接受了我的提议,而且在随后的西藏调查活动中努力把唐卡画师群体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他先后完成了在拉萨、康区和尼泊尔的田野调查,2012年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本《西藏的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多元平衡策略》即是李健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唐卡的发展史,以及历史上唐卡画师群体的传承与执业模式,分析了宗教信仰、艺术追求和市场赢利这三个因素和各自背后的三种追求给唐卡画师的观念和行爲造成的影响。这本书基本上给我们勾画出西藏唐卡画师这个特殊群体在西藏社会变迁中地位的演变,以及画师们在“修行”和“牟利”二者之间的徘徊与选择。总体来说,李健的这本书达到我对这个选题的期望,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但是在比较研究和深层次学术命题的讨论上,这个选题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宗教用品制作是伴随着宗教发展与传播而出现的一个特定行业。西方基督教、东正教的圣像制作即是一个古老而神圣的行业,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我国内地各类庙宇的佛像及其他神像制作也有漫长的历史,尽管制作者可能还有其他兼业,但是毕竟在产品制作范式、人员组织形式上与唐卡画师之间存在某种共性。在这些不同地区的宗教用品制作者行业之间是可以开展比较研究的。从这方面可以说这个选题有可能扩展的一个空间。

藏传佛教直至20世纪50年代,仍然是一个保持了中世纪“政教合一”特点的宗教群体,宗教领袖即最高行政首领,各级政府中僧官多于俗官,寺庙实际上垄断了教育。基督教正是通过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才打破了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并在改革后的新教

五种:(1)绣像“国唐”(用各种不同的丝线经手工刺绣而成)(2)丝面“国唐”(将各色丝绢切成各种形状用针缝接)(3)丝贴“国唐”(将切成的各种彩色布块用胶粘在画布上)(4)手织“国唐”(用丝线经手编织而成)(5)版印“国唐”(用墨或朱砂做颜料,用套版直接印在丝绢上)。第二类用颜料绘制的唐卡叫“止唐”,下分五种:(1)彩唐(用各色颜料画成)(2)金唐(用金色颜料画背景)(3)朱红唐(用朱红色颜料画背景)(4)黑唐(用墨色画背景)(5)版印“止唐”(印在棉布做成的画布上)。



伦理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精神。藏传佛教如果要与现代工业文明和国家体制相适应,宗教改革势在必行。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后,这种“政教合一”体制在西藏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但是并没有反映在宗教教义和广大教众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中。因此,宗教组织的复兴中包含了多种值得调查与思考的倾向。这些很可能也会出现在与宗教密切关联的唐卡画师群体中,唐卡画师的宗教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僧侣的宗教观,在这些方面的深度挖掘与思考也还有待进一步开展。李健的专题研究还只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

201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李健转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社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也给了他许多机会返回西藏从事社会调查,据说他的藏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今年我刚刚毕业的另一个硕士研究生旦正才旦,一个来自青海循化的藏族青年,也加入了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我在北京大学无法组织这样的研究团队,但是很高兴看到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这个研究所开始聚集起一些优秀的青年研究力量。这是让人深感欣慰的一件事。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李健最后修订完成了这本书稿《西藏的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多元平衡策略》。我很高兴为李健的这本书写一篇序言,也期待着这几个年轻人在西藏社会研究方面不断做出更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2015年9月4日于茉莉园

[收稿日期]2015-12-13

[作者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Research on Ethno-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Yin Lun

Abstract:Built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e thought, theory of Xi Jinping's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literary work forum, ethno-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aims to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ethnic policy of China, focusing on the spe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ethnic border areas, and is the perf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ethnic policy. Based on the system of regional autonomy for ethnic minorities, ethno-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should include Chinese ethnic cultural 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and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and art and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the literary and art i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Ethno-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stability and unity of ethnic areas in China.

Key words:cultural diversity; ethno-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ft power(see P.154)